



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系列教材

丛书主编 柳菊兴

丛书副主编 鲁晓成

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教师读本

GAOZHONG YUWEN KECHENG BIAOZHUN JIAOSHI DUBEN

秦训刚 蒋红森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教师读本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编

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系列教材

●丛书主编 柳菊兴

●丛书副主编 鲁晓成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教师读本

主 编	秦训刚	蒋红森	
编 者	秦训刚	蒋红森	胡振富
	周世忠	张银华	何永生
	李少毅	杨邦俊	张爱华
	吴桂清	丁红生	陈俊峰
主 审	鲁晓成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教师读本/秦训刚,蒋红森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

(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系列教材/柳菊兴主编)

ISBN 7-5622-2792-6/G·1459

I. 高… II. ①秦… ②蒋… III. 语文课-课程标准-基础教育-师资培训-教材 IV. G633.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6754 号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教师读本

© 秦训刚 蒋红森 主编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市珞瑜路 100 号/邮编:430079)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北京大学教育书刊音像中心
印刷:北京市通堡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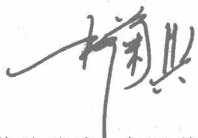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赵宏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新视点
督印:方汉江

开本:880mm×1230mm 1/32
版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数:8001-13000

印张:9.5 字数:213 千字
印次:2003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14.50 元

总 序



随着世界课程改革的浪潮,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在全社会的热切关注和企盼下,国家教育部于2001年7月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一件大事,也是全社会的一件大事。《纲要》的颁布和实施,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将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记得《纲要》颁布的当天,《中国教育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构建基础教育课程新体系》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纲要》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展现了21世纪新课程的美好前景。”文章还强调:“新课程对学校、校长、教师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教研员和教师都要认真学习领会《纲要》的精神实质,以《纲要》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树立新的人才观、质量观、课程观,尽快适应新课程。”树立体现时代精神的新的课程价值观,根治现行课程体系的弊端,是当前课程改革的根本要求。围绕这一根本要求,我们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校长、教研员和教师,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里,一定要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件大事抓好。

综观中外教育改革,无一不把课程改革摆在突出的位置,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都是如此。在课程改革中,各国都想抓住带规律性的东西,都想抓住要害和根本,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应如此。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着“两个不适应”:一是不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二是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高度,从提高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的高度,来认识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大意义,从而进一步增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紧进行部署,认真组织好新课程的实施,扎扎实实地抓好这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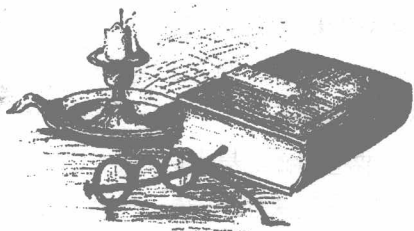
实施素质教育,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新课程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同时也将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为了把这种“转型”工作做好,我们配合当前的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策划、组织并编写了这套“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系列教材”。这套系列教材的特点,一是“准”,它准确地体现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精神,准确地解读了新课程标准;二是“新”,它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和新要求;三是“实”,它内容充实,资料翔实,语言朴实,有很强的实用性。这套教材的编者既有课程改革的专家和学者,也有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教师和教研员。这套教材,既简洁明快,又有一定的深度,不失为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实用性和实效性都比较强的教材。在使用这套教材时,我们希望培训者与被培训者平等交流,平等对话,共同发展。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让我们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吧!

目 录

第一章 语文课程的性质和基本理念	(1)
第一节 语文新课程的文化视角	(1)
第二节 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历程	(4)
第三节 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	(12)
第四节 高中语文课程的设计思路	(20)
第五节 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的比较	(24)
第二章 高中语文课程目标	(32)
第一节 对高中课程目标的基本认识	(32)
第二节 关于高中语文课程总目标	(36)
第三节 必修课程目标	(47)
第四节 选修课程目标	(60)
第三章 高中语文教学建议	(66)
第一节 高中语文教学原则	(66)
第二节 阅读与鉴赏教学	(114)
第三节 表达与交流教学	(127)
第四节 选修课教学	(140)
第四章 高中语文课程评价	(147)
第一节 课程评价的基本理念	(147)

第二节	课程评价的实施·····	(159)
第三节	语文高考与课程改革·····	(170)
第五章	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	(180)
第一节	国内高中语文教材评析·····	(180)
第二节	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197)
第三节	教科书以外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211)
第四节	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	(230)
附录: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	(245)
主要参考文献和网站	·····	(289)
后记	·····	(292)



第一章 语文课程的性质和基本理念

本章以历史文化发展的眼光,从语文教育实际出发,理解、认识语文课程性质和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主要内容有:语文新课程的文化视角、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历程和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并把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作一个概略的比较。

第一节 语文新课程的文化视角

我国母语单独设科已经有 100 年的历史,而作为现代学科意义的探索,近 20 余年则是语文学科发展的重要时期。回顾这 20 余年语文如何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探索发展,可以为理解和执行新的课程标准找到一个历史文化视角。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速度慢,效益低。中央采取的措施,即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与此相应,语文教学也提出了效益问题。这一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效益低。怎么办?经济上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引进,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语文也如此。当时效益低的原

因,从语文教育内部来看,一般认为问题出在语文教育科学化不够。科学出效益。基于这样的认识,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研究引进了“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语文教学的诸多问题,特别是阅读教学领域的建构,都用“三论”来解释。在评价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引进了外国的某些评估测量技术,如标准化考试等。在学科建构上,向自然科学学科看齐,企图建立像数理化那样的知识体系和训练操作系统。1992年修订的大纲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所谓知识体系,即指语、修、逻、文、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等知识,主要是大学中文专业的语言学、修辞学、文章学、逻辑学常识的集合。以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为目的,建立听说读写训练系统。90年代初的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列语文知识19条(所谓知识点),语文训练48条(所谓能力点),这67条同时也就是语文考点,当然也就是语文教学的训练点。高中大纲重复强化这些内容,从知识支撑系统来看,高中语文是初中的升级版。例如文章体裁,是过去单元选文以及阅读和写作的重要知识依据。初中是记叙、说明、议论,高中就在它们前边分别加上“比较复杂”四个字,同样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知识依据。在评价方面,后来加一个《考试说明》。这样的学科建构,加上以标准化考试为主导倾向的评价方式,构成了当时的语文教育平台。

应该说,这是我国语文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引进洋货,学习西方,提倡科学化,无疑有积极作用。它对语文教育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激活了语文教育的各个领域,并有不少建树。例如现在已形成共识的阅读要注意“整体感知”,注意培养筛选、重组信息的能力等等就得力于那个时候的磨合。就像历史上没有佛教的传入、没有基督教的渗透就没有汉语注音系统,特别是后来的汉语拼音一样(参见《新华文摘》1999年11期),这一段

的引进和转化不能简单否定。但是在科学化的追求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局限,也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从理念层面上看,把作为人文科学的语文学科同自然科学的学科等同起来,不可避免地产生理论上的悖论。从实践层面上看,当时的语文知识、能力体系为应试教育行为提供了简单、易操作的平台,使人们过分地重视语文教育的显性目标,甚至误以为语文能力可以由机械、重复、繁琐的基础训练转化而来,学生在浩如烟海的试题中被淹没、被异化。“人文精神淡化,听说训练弱化,阅读教学繁琐化,写作教学程式化”,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语文学科本身也存在异化的趋势。

在思想文化界,引进中忽略甄别和批判,忽略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其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要求否定传统、全盘西方的思潮,引起文化思想界的深刻讨论。反思这个潮流,寻找新的文化建构,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思想领域矛盾的办法。回归传统,驾轻就熟。所以90年代以后,语文界名噪一时的“三论”就逐步走向式微。尽管其合理因素客观存在。那么,我们回归传统做得怎么样呢?现在看来,多是依赖习惯思维,同样缺乏批判和理性。其消极结果导致伪科学兴起,封建迷信死灰复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随之觉醒和发展。照搬洋人的不行,率由旧章,遵循祖宗,也有问题。改革者转而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总结、认真反思、实事求是地评价,研究我国的传统教育形成了一股潮流。与此同时,也十分注重汲取世界文化中有用于我的因素,与时俱进,洋为中用。于是语文界的“科学(工具性)”、“人文”之争波澜再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在争鸣中逐渐形成共识。我们的课程标准就是从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走上舞台的。打开语文课程标准,就能明显地感觉到它的时代

烙印和负载的文化分量。因此,从祖国文化传统看过来,从世界文化趋势看过来,是我们解读语文课程标准所必需的历史文化视角。

第二节 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历程

一、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历程

20世纪初,废科举立学堂,国文从科举的奴婢地位解放出来,从那时候起,知识界就一直在探讨“国文是什么”的问题。1912年11月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第3条指出,“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中学校令实行规则》第3条也指出,“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慧”。1923年,由叶圣陶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的“目的”部分指出:国语要“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引起学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这些都明确了国文的功用。1929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要求学生“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第一次提出“工具”概念。明确提出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并加以阐述的是1956年颁布的《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份文件指出:“汉语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有力的工具。列宁教导我们说:‘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中,语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社会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社会本身就无法继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生产斗争和发展的工具。”自此以后,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就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固定下来,只是表述略有差异。1963年的语文教

学大纲表述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工具。”1956年的初中和高中语文教学大纲指出：“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是帮助青年一代认识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80年、1986年、1990年、1992年的教学大纲表述为：“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1996年、2000年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些表述差异，除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外，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语文到底是什么样的工具，或者说语文这个工具到底是干什么的。对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的认识是一致的。这个认识的经典阐述首先得到叶圣陶的著作中去找。吕叔湘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中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进一步解释说，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很多教语文的人和学语文的人认识不清呢？是因为有传统的看法作梗。“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惟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需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书中的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得‘食廩’，飞黄腾达起来做官作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晌，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叶圣陶语）语文从古典走

向现实,由追名逐利的敲门砖到人生日用的工具,是语文性质认识的重大突破,符合语文学科实际,因而得到语文界的普遍认同。

由于语文学习内容的特殊性,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中,人们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除了工具功用以外,语文课还有无法否认的“附带”功能。从历次修订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中关于语文性质、功能的表述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932年、1936年、1940年、1941年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都强调:“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的文化”,以培养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意识,注意到了国文课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及其教育功能。1955年、1956年的语文教学大纲,都强调语文这一工具的思想教育作用,指出“语文科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的强有力的工具”。1978年、1980年的语文教学大纲进一步指出:“在语文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和读写训练是辩证统一的。”1986年、1988年、1990年、1992年的语文教学大纲都指出:“语文学科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1996年的大纲在语文学科性质表述中首标“文化”二字,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当然“载体”仍然是以工具为本位。2000年试验修订版写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确认语文的文化性。这些表述中出现的“思想性”和“文化性”是两个有差异的概念。就广义的“文化”而言,文化涵盖思想,后者比前者外延要宽泛得多。仅仅强调思想性,不全符合语文学科内容的实际,不利于语文课程本身的发展。

二、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把语文课程性质界定为:“语文是最重要的

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是语文课程性质认识的历史总结和升华。语文的工具性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这种工具的主要功能作用是什么,一直在探讨过程中。说它是“交际工具”,常识告诉我们“交际工具”不限于语文,所以新课程标准加上了一个“最重要的”。语文教科书以文选方式呈现,而不是直接、单纯地展示“工具”。选文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式反映人类生活,内容丰富多彩,其教育功能具有多向度的特点。学语文,远远不只是学“工具”。所以反思语文教育,人们对语文的工具性表示怀疑,争议颇多。一度有人对语文是否具有学科资格提出了质疑。依据语文课程的实际情况,课程标准把“人文性”(文化性)作为语文课程的第二属性,并进一步指出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统一的。

应该肯定,这个性质界定,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语文课程自我认识的一次飞跃。在目前认识水平上,它符合语文课程实际,符合语文教育要求,对于语文教学、人才培养、课程发展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中学语文教学讲究实用。教师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

为什么要讲究实用?这由语文的工具性质所决定。

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必然要交往,交往就要借助于一定的中介物或一定的工具。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的工具多种多样。如古代烽火台上举烽火,表示有外敌入侵;某种场合以击鼓为信号,传递消息;旗语、手势语、某种特定的实物等等,均可交流信息。

尽管交际工具多种多样,但在通常的场合,人与人之间每时每地大量使用的交际工具是语言。

语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不是人际交往的惟一工具,但确实是最重要的工具。语言属于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它为整个社会服务。任何一种语言不因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作彻底的变革,也不因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消亡。文字是记录言语的符号。

语文是交际工具,绝不等同于一般的生产工具,如机器、锄头、犁耙,也绝不等同于一般的生活工具,如筷子或拐杖。语言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信息的载体。这种工具、外壳、载体,都是只有人类才拥有的符号,因而,在符号的意义上把握语言的工具属性,比较恰当。吕叔湘在《人类的语言》一文中说得好:“人类语言的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办不到的。”

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语言是现实的意识,语言和意识密不可分。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个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符号因意义而存在,离开意义,符号就不成其为符号。这就是说,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

西方学者把语言看作开启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奥秘的钥匙(意大利维柯,1668—1744),认为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德国洪堡特,1767—1835),不仅视语言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美国萨丕尔,1884—1939),还把语言看作文化建设中的一种力量(德国魏斯格贝尔,1899—1985),认为语言和文化相互塑造,相互渗透,相互从属(美国沃尔夫,1897—1941)。显然,他们对语言的人文属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均有自己的研究与看法。如果说,世界各民族语言都具有人文性,那么,汉语汉字的人文性可说是特别突出。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春秋谷梁传》)“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日》)著名的名实之争,文道之论,言意之辨,在某种意义上,都关涉到汉语人文性的阐发。朱熹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从此类论述中,可以体悟古人是如何把语言同人性、天道、事理联结在一起的。中国现代学者对于汉语的人文性,也多有创见。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它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

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由于它有自身许多特征组合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如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习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而民族语言负载民族文化,是根之根。语言文字在民族生命的组合中,对外是屏障,对内是血液,是粘合剂。语言文字这个工具在为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渗进了民族的个性,成了民族的财富,民族的标志。可以这样说,语言是民族的生命,民族的血液。汉语言文字负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语言这一工具和它装载的